

食里万象，方寸餐桌的文明映照

■俞耕耘

餐桌上的文化心理

近代以来的广州接纳过无数西方人，既有外交官、画家、商人、学者，也有船员或雇工。他们的身份阶层、职务不同，对中国的认知也千差万别。

《洋人粤食记》一书收录一百多年前外国人对广州宴饮的印象掠影，这些文字多来自书信、日记或游记。正如该丛书名“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它呈现出编选者的聚焦视野：一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镜像，二是对原始文献“遗珠”价值的再次发掘。

英国商人沃尔特·芒迪所记的花船夜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中西文化心理的分野。“晚餐是他们的午餐，也是目前我们有机会观察中国人习俗与品性的重要场合之一。”从而，餐桌上的心理分析是写作的核心。主客之间充满氛围感、节奏感与舒适度的微妙感应。如何在宴席中达到诸多要素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在宴会欢愉的气氛中他们会放下几分内敛，纵然只是些许松弛，也会令他们向彼此显露真情。”而如果晚餐接近尾声，主客间仍旧生疏而戒备，那必然是一场失败的宴饮。

外国作者置身“客位”，表面冷眼旁观，实际暗藏情感判断。往往于无声处，实现了述评的巧妙融合。芒迪认为，如欲窥探对方内心，最好使其置于东道主之位，如此就很难伪饰。“哪怕是最倔强的灵魂，也都难以在这样的宴饮中孑然孤立。”难得的是，书中呈现了外国客人与中国主人的心理博弈与等价计算。中国人做东，坚持完美的品控，于细枝末节里体现严谨礼仪，时刻留意客人并未言说的需求。“加之他们很有教养，愿意牺牲自身的舒适和习惯，来迁就宾客的偏好。”而主人的付出是否值得，则取决于客人的回馈态度。“即便欧洲人不习惯陌生的宴会环境，甚至对主人奉上的菜品感到陌生，但和东道主共处一桌时，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宾至如归，与主人相处友好。”

这些描述几近切中了礼的克己内涵，也强调了礼需要讲求往来回应。“每人面前都摆着一双筷子，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主人驾驭它有困难，就会得到一把小叉子。然而我们下定决心要赢取众人的欢心，因此坚定地选择筷子。”尊重与回敬，二者相伴相生，互为一体。发请帖的仪式感，即是待客以诚的写照。甚至，中国主人还打破了对客不待客的规矩，慷慨地“让我尽情邀请友人，并由我挑选日子赴宴”。外国人感激这种周到贴心：主人安排“中间人”与“熟人”作陪，最大程度避免了尴尬陌生的氛围。

以饮食为核心的生活艺术

在我看来，既然有“比较诗学”之类的学科探索，比较饮食学的探讨也就自然而然。比类与比附，是不同文明互鉴的基础。其中，关于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观察，体现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态度。在书中，不同作者对粤人饮食的理解，本质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他们都尝试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找到相似的习俗传统，对应的食品类型，借此达到文化传播。他们提到，“白酒是用粮食做的，味道有点像淡淡的威士忌”“中国主人会用地窖里最陈年的蛋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就像英国主人会用他酒窖里最陈年的葡萄酒来招待客人一样”。

而当作者无法理解，出现“误读”时，反而更凸显出特色。如中国餐桌上的极尽友好，不免使外国人背负心理



饮食蕴藏着深刻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 AI制图

负担。他们面对海量菜品，压力巨大；主人从自己盘子里夹菜让菜，迥异于西方；以敬酒为考验，很难招架；猜拳罚酒的游戏，也未免吵闹。

如果说，中国宴席与西方餐饮有何本质不同，答案或许是中国人建构了以饮食为核心的整套生活艺术的系统。我将其概括为：食色声乐、赏景怡情的审美追求。外国作者惊异于中国宴饮可将美景、美酒与美食融合。如晚宴在珠江船城中的花船上举行，这些船连在一起犹如美妙的水街。宴席上的吹奏献唱，如同韩剧夜宴的完美绘卷。

书中提到一位格雷夫人的记录。她婚后曾随丈夫在广州居住14个月，在此期间，她通过书信描述广州见闻和家庭事务。这些信件展现了一位异国女性对私密生活、日常起居的浓厚兴趣。她将宴会主人赞誉为中国绅士和中国夫人，繁复地罗列了上菜次序，每道菜、小碟佐料；留意就餐的各种间歇、节奏与穿插。

同时，她在意就餐习惯与环境营造，如同批注和笔记。露天的餐厅正对着漂亮庭院，盛放的荷花是最美的装饰。“我们按照中国的习惯，先从桌子中间的水果开始，享受我们的晚餐。”在中国酒席上，肉菜和汤一轮一轮送上，准备的食物不尝一口是很不礼貌的。粤食将吃的程序、仪式与氛围，发挥得淋漓尽致。

粤食背后的生存哲学

粤人将传统与新变、程序与秩序、饮食与实在、语言虚实的艺术融入饮食，蕴藏着深刻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从修身到治国，古人以“烹小鲜”作比附，自然有其道理。可以说，待客、看茶、饮食之道，透露出中国人

思维模式、安身立命的根底。外国人能体会到中国的礼，是从形式到内容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客套中的真诚，充满善意的实在。请帖“表现出中国人的客气、谦卑和礼貌，它完全可以与我听见过的欧洲宫廷的任何信函相媲美，可能也同样真诚。行商的晚宴也不只是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盛宴”。

当爱尔兰作家约翰·哈代说出“广东人不吃的那就真不能吃”这句话时，表面看他概括了一种吃尽万物的世界观，实质却是佩服粤人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生猛的禀赋品性。从根到叶，从外皮到内脏，从昆虫到爬行动物，粤食极大拓展了人类饮食的疆域。在我看来，这正是饮食中的实用主义哲学。然而，粤人同样秉持有所食、有所不食的敬畏感。如华南人不吃黄牛或水牛肉，因为它们对农业贡献极大，这反而说明饮食里亦讲仁义。

在我看来，此书对中西文化相遇时的各种境遇和心态，做了深入幽微的揭示。它既反映西方作者的犹疑、困惑和试探，也体现中国宴席主人的好奇、热情与包容。尽管，西方作者惯有的中心论仍将粤食视为被凝视的他者。“偏见使大多数人不敢去品尝放在他们面前的奇珍异味，即使那些有胆量尝试的人，也吃得非常谨慎。”

但有趣的是，他们大多主动迎合当地习俗，尝试以本土思维与粤人交际。“我们的努力令东道主非常高兴。显然，我们选择这个国家本土的饮食方式讨得了他们的欢心。”换言之，他们很在意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并表现得乐于融入，富于好奇。由于旅居范围所限，他们理所当然地将粤人视为中国人的代表，并将粤食作为中国菜的象征，难免以粗概念。虽然西方作者的管窥停留于粗浅印象，但已经尝试分析中国符号、仪式程序的价值内涵。即使存在误读，也仍然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自己的“观看之

道”，成为了解中国饮食之道、为人之礼的窗口。

通过食物，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从抽象观念层面，具化为感官体验，深化为情感体认。《洋人粤食记》始终围绕广州与饮食两大主题。一方面，广州作为近代中西方交往的重要前沿，衍生出大量跨文化交往的实践范例。另一方面，饮食作为人类共有、互通的物质需求，乃是承载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的重要载体，是文明互鉴对话的桥梁。粤食的历史积淀，本就是中西古今交汇，不同文化整合的代表。餐桌上的主宾之道，恰恰说明粤人乐于接纳、善于对话的文化自信，不惧偏见、分歧和障碍的心胸格局。此书将“口述历史”与“文化观察”相结合，以文化记忆的样态保存了大量广州生活场景和精微的饮食细节，尤为难得。



《洋人粤食记》 [美]李国庆 [加]甘露 编译 岭南古籍出版社

■宋超

藏在典籍里的华夏科技密码

中国古代的科技探索是华夏文明五千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与文化因素，古代的科学探索并不受重视。近代历史的种种遭遇又迫使中国人猛然觉醒，重新看待科学、逻辑、理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现代文明由此重塑新生。近日，郭建军编著的《探寻华夏文明的创新基因：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趣读》出版，为大众走进古代科学典籍的精彩世界，给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示范。

本书选取了十部古代科技典籍名著，并对古代科学家们的生平经历做出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

今天的人们会将知识技能划分为科学、人文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但在古代，书画家大多也是诗人、学者，很有可能还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这是传统社会士人群体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书中选取的古代科学家身上同样突出：贾思勰在北魏担任过高阳太守，孟诜在唐朝先后担任过侍郎、刺史一类的高等职位，沈括是北宋朝堂上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李诫一生几乎都在工程建筑部门任职。

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包含在传统文化哲学之中，如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也多处于传统士人的阶层之中。本书指出沈括的《梦溪笔谈》实为渊源自有的“典故之学”，却细致地讲述了从皇帝祭典礼制到国家盐业分布，从北方的白雁跳兔到岭南的鳄鱼鱼骨等具体内容，共同成就了《梦溪笔谈》的博大精深。

同样，中国古代的科学家谈论的内容也不离百姓日用——《九章算术》讨论的是测量田地、牛羊算价；《天工开物》涉及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至于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大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为了避免空泛地堆叠材料，作者在选取书目时颇下一番心思——《墨子》《考工记》是古代科学典籍的开山之作，《诗经》《茶经》《食疗本草》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九章算术》则被视为“算经之首”。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只有选书得宜，才能持简驭繁。

选书之后，如何引导读者进入文本，也十分重要。本书选取了《考工记》中制车、冶金、武器、乐器相关技术的段落，不仅提供了可靠直白的参考译文，更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一下拉近了我们与两千多年前古书的文化距离。

科学典籍的资料来源广泛，因此对文献的考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人笔记小说的材料选取在后世看来也要深思考证。

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古代优秀的文化和科技著述，让“科技”与“传统”相得益彰，找到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化血脉。

《探寻华夏文明的创新基因：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趣读》 郭建军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又见谭嗣同的孤勇与赤诚

■王夏刚

自梁启超那篇荡气回肠的《谭嗣同传》问世以来，“谭嗣同”便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中一个崇高的文化符号。此后，关于他的著述，或钩沉史料，或剖析思想，或考证交游，各擅胜场。然而，彭晓玲所著的《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却带来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让我们仿佛穿越时间的帷幕，与一个更真实、血肉丰满的谭嗣同直面相对。

本书在结构上匠心独运，十章标题皆化用诗句，不仅提纲挈领，更营造出一种深远的诗意氛围。从隐喻童年磨难的“潇潇连夜雨声多”，到概括西北游历的“短衣长剑入秦去”，再到标志思想成熟的“一天风雨写离骚”，直至生命绝响“我愿将身化明月”——这十条诗意的脉络，如同十幅精心构思的历史画卷，环环相扣，不仅形象生动地串联起谭嗣同的一生，更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奇变”紧密交织。这种布局超越了线性的生平罗列，构建起一个情感与思想逐层递进、螺旋式上升的立体空间，让读者在诗性的节奏中，体悟谭嗣同精神世界的演进与升华。

本书共分十章，每章又有分节标题，从多个层面反映了谭嗣同色彩斑斓的一生。而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其“文史互证”的深厚功力。作者并非简单复述已知史实，而是通过深耕第一手文献，在关键处填补历史想象的空白，让人物变得可感可触。

例如，在叙述谭嗣同12岁罹患白喉的生死关头，作者并未止步于引用谭嗣同本人“短死三日，仍更苏”的自述，而是首次挖掘并引用了其父谭继洵在当时写给其伯父谭继昇家书中的详细记载。家书中的焦灼与为谭嗣同预备后事的无奈，瞬间将读者拉回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现场，让一段遥远的史料变得无比真切，凸显出传记写作的实证根基。

傅兰雅、相遇龙头斋等章节，则分别叙述了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前的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众所周知，有关谭嗣同这段人生经历，目前存留的相关记载较少。但彭晓玲仔细梳理了谭嗣同记述中的关键史料，运用文学的语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的谭嗣同成长履历和师友交往图景。在“投身科考”一节，作者使用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所收的两份谭嗣同履历档案，使读者对谭嗣同的人生履历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同样，在“浏阳兴算”这一标志谭嗣同投身维新起点的关键事件中，作者凭借其对浏阳本土历史与家族关系的熟稔，细致梳理了其中复杂的人事网络、纠葛与性情往来，超越了以往研究多侧重理念阐发的局限，生动再现了理想在现实中扎根、萌芽的艰难过程。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使得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挣扎与抉择格外动人。

谭嗣同的一生，充满波折。童年遭遇家庭变故的不幸，青年屡试不中的艰辛，以及在参与维新事业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波折，磨炼了谭嗣同的性格，成就了其慷慨悲壮的一生。彭晓玲跳出了脸谱化的描写局限，用细腻的文笔，细心体悟谭嗣同每一个人生阶段的别样精彩。她所述写的谭嗣同，既有惊人才华，又有高洁品行；既有勇往直前的侠骨，又有千转百回的柔肠。

也因此，彭晓玲的笔触兼具史家的冷静与文学家的温情。她善于体察传主内心的幽微波澜，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复活历史场景中的人性温度。

她写谭嗣同的敏感性：“真是特别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如此敏感，就有如此悟性。”寥寥数语，为其一生激越而悲怆的基调写下了最早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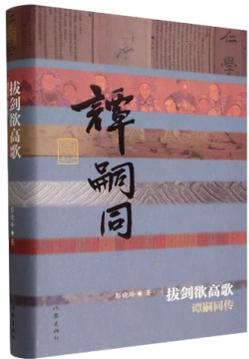
她写西北山河对少年谭嗣同的塑造：“在宽广辽远的秦陇大地上，潼关奔腾呼啸的长河，秦岭巍峨汹涌的峰峦，祁连山凛冽灼目的雪线，秦铭记着这个长剑高歌的年轻人。”磅礴的景物描

写，与传主开阔胸襟、豪侠之气的形成同频共振，实现了环境、性格与命运的三重交响。

更重要的是，作者总能恰到好处地引用谭嗣同的诗文书信，真正做到“以谭证谭”。诗文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融入其生命特定时刻的情感注解，使其“兄弟情、师友爱、家国情”得以立体呈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改革志士，更是一位情感丰沛的诗人、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

《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的成功，在于完美地平衡了学术的严谨与文学的感染力。彭晓玲在她的《寻访谭嗣同》《谭嗣同》等作品基础上的持续深耕，使其对谭嗣同的理解达到了“沉潜体悟”的境地。她以扎实的史料为筋骨，以文学的想象为血肉，以深刻的共情为灵魂，最终让谭嗣同这个标志性人物从教科书的概念中“复活”，回归为一个有爱憎、有矛盾，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索的、真实而伟大的生命个体。

此书不仅是向湖湘先贤的深情致敬，更为当代传记文学如何书写历史人物提供了卓越范本——真正的理解，始于考据，成于心文，终于对人性光辉的深刻体认。



《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 彭晓玲 著 作家出版社

数字动画美学嬗变之路

■王艳玲

数字动画正成为当下动画产业发展的热点与焦点，天津科技大学段艳红教授的新著《中国数字动画电影美学的嬗变研究》，在电影本体论视域下，深入剖析了中国数字动画电影与真实场景之间的复杂关联，从“媒介”和“受众关系”角度出发，挖掘了受众对中国数字动画电影美学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她详细阐释了“数字化技术”“中国动画电影”及“电影美学”等关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对“中国数字动画电影美学形态的嬗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在分析阐释之后，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作者聚焦数字时代动画美学的核心问题，围绕数字动画电影的外在美学特征、内在美学表达规律、美学变迁动力以及视听语言系统等问题展开探讨时，作者提出“数字技术生成的动画电影美学是一种虚拟合成技术美学”，这一观点是对美学理论进行的有效重塑与创新。在传统电影美学中，真实美学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数字技术的介入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格局。虚拟合成技术美学强调数字化、合成性与奇观式的融合，用程序替代传统的造型能力，重新定义了电影美学的内涵与外延。即在三维动画电影中，通过数字建模构建出的奇幻场景和角色，不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却能够以超强的视觉冲击力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这种对传统美学范式的重新审视与拓展，为动画电影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与视野。

新著也深入探讨了媒介与受众、传播者与受众、动画产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随着数字动画电影的跨媒介、跨群体、跨域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逐渐从被动转变为主动，衍生出了多元美学的新现

象。电影符号学被作者用来解读动画电影中符号的表意功能；电影叙事学则深入剖析叙事结构与技巧；通过文本分析深入挖掘动画电影中的叙事元素，并结合深度访谈，了解创作者的真实意图，从多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叙事美学的变迁过程与内在规律。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的重构以及动画产业与受众的融合，为动画电影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发现动画电影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此外，这部新书探究了数字动画电影在电影本体论视域中的美学变迁，以及与电影真实性表达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指出，数字技术的出现让“真实的场景”能够在虚拟梦幻的数字世界里得到再次呈现，这种用程序代替人类造型能力的方式应运而生，为动画电影的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动画电影的美学边界。

作者还指出，媒介与受众关系的变动，促使多元美学的产生，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积极参与到动画电影的传播与解读，形成了粉丝文化、二次创作等崭新的文化现象。通过对2000年至2020年间中国数字动画电影美学的系统剖析，作者从电影叙事学构建真实内容、拓展非线性时空、设置多层次叙述关系等视角，对传统动画电影与现代动画电影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展示了数字动画电影在美学层面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书中提及的一些中国动画电影在动作捕捉、特效制作等方面的创新技术和艺术处理手法，为动画电影的制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数字动画电影美学的嬗变研究》 段艳红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